

THE SIXTIES
AND THE END
OF
MODERN
AMERICA

六十年代

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美〕戴维·斯泰格沃德 著

E SIXTIES AND THE END OF MODERN AMERICA

THE SIXTIES AND THE END OF MODERN

ND THE END OF MODERN AMERICA

THE SIXTIES AND THE END OF AMERICA

THE END OF MODERN AMERICA



商務印書館

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美〕戴维·斯泰格沃德 著

周朗 新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2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美)斯泰格沃德著;
周朗,新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ISBN 7-100-03368-3

I. 六... II. ①斯...②周...③新... III. 政治-
概况-美国-1960~1970 IV. D7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797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

〔美〕戴维·斯泰格沃德 著

周朗 新港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68-3/K·719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导 言	(1)
第 1 章 自由主义的终结	(4)
第 2 章 民权运动	(52)
第 3 章 越南战争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100)
第 4 章 战争中的社会史	(137)
第 5 章 红色的十年	(176)
第 6 章 文化的终结	(225)
第 7 章 城市危机	(276)
第 8 章 大熔炉之外	(320)
第 9 章 权威的危机	(363)
第 10 章 社会现状的报复	(407)
译名对照表	(449)

导 言

约翰·F. 肯尼迪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号召同辈的公民们把个人目标置于更崇高的国家利益之下,以此开创了 60 年代的纪元。他相信他们可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让每个国家都知道,无论它希望我们或好或坏,我们会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迎接任何困难、支援任何朋友、对抗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与胜利。”1974 年,当理查德·尼克松宁可辞去总统职务也不愿面对由于冷嘲热讽、自私自利以及权力追逐导致犯罪行为的确凿弹劾时,他使这个时代到达了终点。

在此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肯尼迪号召为国家牺牲之时,白人至上主义在南方仍牢固坚持着。南方的非洲裔美国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在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的一些县里,整个 20 世纪没有黑人参与投票选举。那些对这一制度质疑的人常常遭到谋杀。这个国家在别处关于种族关系的记载也没好到哪里去。美国社会处处保持着男性至上。妇女被否定了在工作场所的基本平等并被假定为热衷家务的生物。公司不提拔妇女,除非有特殊的机会。举个例子,女记者在国家新闻俱乐部的午餐会上被迫坐在阳台上,照例被拒绝去采访那些男同事获得的能使自己事业发展的报道。甚至女子大学也强加着装规范,限制她们为科学做贡献,使家庭经济成为强制性课程。在有些州妇女不能参加陪审团。在马萨诸塞州,医生给病人分发避孕材料被视为违法。

检查员和道德家统治着文化领域。在纽约,只有因通奸行为

2 导 言

才准予离婚。电影受到筛选,作家受禁令,他们的书受到威吓。隐私权照例受到侵犯。特别当性与性行为的争论尚在进行时,权威们常常是压抑着,极力假装正经。最轻微的带性暗示的材料都足以使文化监察人员们变得神经质。大学管制着学生的生活,实行性别隔离以及强制宵禁。

当尼克松离开公职,这些美国生活中的保守成分看来不只是10年的时过境迁,而是一个世界的离去。国家制度、社会风俗以及思维习惯都受到了根本的挑战和转变。

- 2 无论如何,尼克松的个人辞职,在我们庆祝60年代成为一个人类进步的时代前,给我们画上了休止符。为了完成所有至关重要的转变和使公正得以实现,许多在1960年还较少吸引人的力量到1974年就多多少少更为强大了。1960年的美国人是历史上最富有的人民,但到1974年,尽管进行了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国家财富却无力扩展。其间,这个国家的城市在加速瓦解。从一个主要由种族和民族的少数群体组成的城市“下层阶级”中,诞生了一种强烈绝望的文化。所谓的军事—工业联合体,虽然在越南战争中受到质疑,但基于冷战思想仍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继续存在着。曾经给美国带来空前财富的消费资本主义开始展现后工业的未来——蓝领工作消失或转移到了海外。消费者文化不仅生存于60年代,而且变得更加强大,这要归功于对年轻人市场的操纵。美国人生活中的冷漠疏远和无意义——60年代早期热诚的理想主义者在变革时所反对的——通过基于特有的服装、音乐、精选的毒品、性价值观及政见的年轻人文化的行销而得以减轻。但最后这些事物并无多大改变。

美国在60年代并没有跳出一句古老格言的圈子,许多在当时看来完全得到肯定的发展结果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不可预料的

灾难以及荒谬的结论。许多绝妙的主意结果不是甚好。当时重大的开明的改革导致下层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主要是因为民众向改革支付了税金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通过大学延期以逃避征兵的年轻激进分子,在呼吁关注灾难性的越南战争的同时,也促使那些儿女被送往东南亚的人们产生一种复兴的爱国主义。脱离了监察人员的文化解放使艺术家得到自由而只给艺术很少的自由,使之日益成为投资者和大商人的领域。“爱的一代”带来的性革命被人们鼓励为有益健康的自由,与视其为性暴力及堕落的人数差不多。中产阶级家庭的爱面子把妇女带入了一个无法实现工作的世界,并且由于鼓励家庭崩溃,其趋势是男子的解放多于妇女,妇女则更频繁地在抚养他们的孩子方面承担惟一的责任。60年代只有两个明确的发展,一个很好,一个在我看来是令人震惊的,分别说来就是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其他方面,则交织了大量的智慧与正义,愚蠢与残酷。

社会与政治的僵局导致了既无明显的胜者也无明显的输家,并使大多数社会问题处于无法解决的状态,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遗产。美国的改革论者视60年代为一个被战争和右派反抗突然终结的巨变时期,其结果只是这个国家的局部解放。另一方面,这十年被视为一个权威和道德方面的国家危机的发端,通过使反社会行为合法化而最终更多地伤害了穷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未离开60年代。僵局延续至今,在近³来25年间,在自我标榜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持久的意识形态分歧中,它被视为最有力的因素。60年代是左右两派的萌芽时期,实际上这一时期也是同时代美国人各自阐述的中心。

第 1 章 自由主义的终结

- 5 美国在 60 年代的兴衰最主要地表现为美国自由主义的兴衰，它的复兴是以 1960 年约翰·F. 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为正式标志。正是肯尼迪号召美国释放出理想主义，他鼓舞了变革的希望以及他和他的后继者都不能实现的令人激动的前景。被自由主义者复兴的理想主义通过无数方式攻击着理想主义本身。

自由主义的兴衰更替太快以至于可以视其为戏剧性的事件来解释，如城市骚乱、来自激进学生的挑战、春节攻势和反战运动。从更为宽广的观点来看，无论如何，自由主义命中注定要致力于一个几代人的传奇，回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交替时进步党人的变革时期。从那时起，自由主义者就站在那个“小人物”一边了；虽然他们是视资本主义为一种社会制度的支持者，但成了商业思路的批评家；他们把政府作为改革的工具和利益集团间的仲裁人；他们为自己的利益目的而汇集了学究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在 30 年代，富兰克林·D. 罗斯福集中了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他种族的工人阶级、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组成了历史上最有压倒优势的选举多数，使改革者的自由主义在民主党内得以制度化。

1968 年自由主义的崩溃表现了这种现代自由主义的枯竭。罗斯福联合瓦解，因为日益富裕的经济状况使产业工人如中产阶级般舒适，即使达不到中产阶级的地步，工人也变得“保守”。由于富裕程度分布不均，种族间关系紧张而置阶级团结于不顾。当自由主义者急转弯来调整时，他们就陷进了圈套，必须从舒适的工人

阶级和中产阶级两者中选择一个支持者,他们是选举人中的大多数,也可以促成无力的少数派。在林登·约翰逊社会改革的“伟大社会”计划中,自由党人与可怜的少数派站在一边,许多改革直接归他们指挥,而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被抛弃并要为改革付出代价。由于“伟大社会”,自由主义者自己到了终点。当城市骚乱持续,阶级和种族对立恶化,以及政治冲突升级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已经无言可对了。

自由主义的再度觉醒

60年代自由主义的再度觉醒缘于对阿德莱·史蒂文森竞选失败⁶的反应,他是1952年和1956年选举中民主党主席的候选人。史蒂文森作为一个天生的民主党人更甚于他的坚定信仰,他从不与劳工—城市一种族联合体有任何联系。作为候选人,他通过呼吁他认为的选民的高贵天性来围着政党机器转:即为“公众利益”或国家精神承担义务。在公众生活中,史蒂文森机智而世故地摆出一付空想主义知识分子的态度,但这种姿态用来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那样的战争英雄对抗是无效的。

史蒂文森没有把自由主义者带回白宫,但他带给公众生活的问题却很快成为美国政治中根本的重点所在。史蒂文森是关于艾森豪威尔依赖核武器的一名孤独的批评者。他也把关于对外政策的话题转移集中到第三世界上,那是一个艾森豪威尔假定为可以恫吓的辽阔多样的地区。史蒂文森辩论说,以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扶植反共产主义政权和授意中央情报局发动政变——在第三世界的长期胜利是无法实现的,那将要求美国实现民主党的理想并为后殖民地国家做出榜样。在国内问题上,史蒂文森大胆强调

正是狂热的物质主义——从对消费品的渴望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摧毁着这个国家最为珍爱的理想，为公众服务的理想。

即使不是选举人，独一无二的雅量和风度也为史蒂文森赢得了朋友，其中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致力于夺回国家政权。出于希望驱使他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全体选民和政策为民主党带来了一连串显赫的胜利”的观点，这些知识分子以其1956年的政治纲领——要求供给公共住房，提高最低工资，对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更明确的承诺，以及增强社会安全——来说服史蒂文森改变观点。

不难看出为何史蒂文森会屈从于那些知识分子的建议。他在50年代中期已经从他们那里借鉴到比政治纲领多得多的东西。他对于美国物质主义的忧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的回应：出于对商品社会、郊区化以及这一时期出现在众多社会批评中的官僚政治生活的不满。举例说，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戴维·里斯曼认为美国人已变成受人支配的因循守旧者，中产阶级依照他人的看法来估量其自尊，而非个人或传统的道德目标。里斯曼所指的受人支配的人当然不是美国历史上作为先驱的个人主义者，其他的研究对此作为回应也有评价，如威廉·H. 怀特的同样著名的《团体人》。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的结果是美国苦恼于它最伟大的成功。美国人陶醉于历史上最富有的社会，但他们出卖了他们全体的灵魂，拿国家的道德品质做交易以得到轻松的白领工作来购买郊区的房子和新汽车。正如史蒂文森再三强调的，富足自身是不会终结的。

- 7 如《孤独的人群》这类著作对美国人性格中官僚主义化的框架作了深刻本质的分析，但在自由主义的控制下它们最先成为顺从的批评。不断地唠叨服从或者对团体人缺乏动力喋喋不休则是从

大体上承认了美国人生活得好。他们不用遭受来自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他们也不再害怕传染病的恐怖(可怕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已经被赶走了)。尽管过去左翼和自由主义的批评集中于资本主义在广泛散布其好处的“先天的”无能,但在 50 年代末,任何一个想要成为美国生活批评家的人不得不开始承认实际上资本主义运作得很好。因此,左翼的批评家们开始唤起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缺点的关注。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开始争论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人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继续以个人主义的无用的旧观念来思考。

这在自由主义最重要的鼓吹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中是共通的信息,他在十年间出了两本书来阐述直到 1968 年为止的主流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衡力量的概念》(1952)一书中,他指出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成长壮大到足以抗衡公司的力量,这使美国政治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由于联邦政府站在仲裁人的立场,资本家与工人现在只是争论,而后寻求妥协以确保稳定。加尔布雷思力量制衡的理论是不久后成为利益集团自由主义理论的首次表现,而后者作为妥协与有组织的程序的代理人,在政治上起了保卫着利益集团的作用。

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一书定义了自由主义的政纲,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的社会》(1958)仍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特性。在一场关于普通经济学观点的争论的伪装下,这本书号召美国人抛弃过去。依照商业领袖及经济学家一致坚持的“传统的智慧”的说法,经济成功依靠的是职业道德和无畏的竞争,加尔布雷思强调传统的智慧产生于“萧条时期”,在一个空前富足和空前合作的团体的社会里,其价值观是过时的,或者说甚至是破坏性的。富裕使竞争的努力成为多余,美国人需要离开竞争去放松一下,致力于诸如延缓公共投资和工作性质的问题。不存在许多其他的真正的问题。例

如,贫困仍存在——加尔布雷思称之为一个“耻辱”,虽然几乎不是什么“大的苦恼”。贫困在美国只是零星可见,作为一个系统问题,可以通过假想的公共政策来消除,包括道路与桥梁、低收入者的住房供给以及教育的公共改进措施。加尔布雷思在极大的程度上似乎在说,这个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世界上一切都好,即使只有美国才能承认。

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与不久后出现的激进主义相比,是世俗化的、机智、有趣,但十分安全,并且仅相对于其他哈佛大学教授的著作而言是大胆的。当他证实利益集团竞争的合理性时,他只不过
8 以一个“概念”证实了现状。《富裕的社会》同样认可了经济学的现状。加尔布雷思更希望的是一种精神的转变。

这种国家精神复兴的号召——深深地打动了阿德莱·史蒂文森——恰恰点燃了自由主义的幻想。处于60年代的边缘,自由主义者开始感到变革临近。作为加尔布雷思坚定的自由主义的同僚,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约翰·F. 肯尼迪的就职典礼前夕写道,当这个国家准备重申其“活力与特性”时,“任何人都感觉到我们正在临近那一时刻”。“那种支配了这个国家10年的情绪似乎开始变得稀少而不相干;……不再因为一个人而解释我们的愿望与需要;……新的力量,新的精神,新的价值观正在极力表现和释放出来。”施莱辛格概括了自由主义的议程:更好的教育,改善医疗保健,公民权,公民自由,“提高我们的流行文化的地位”,以及在外交政策上做个激进分子。他和他的同僚们不能被认为是无用的空想家。然而美国人的失败不是一个计划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失败,以及来自“60年代的挑战”——以施莱辛格的观点是“美国人价值观的重组”,为了把人们从愚钝的物质主义中召唤到一些“国家目标”上。

施莱辛格留意的国家目标是双重的：在国外与共产主义战斗并在国内鼓励理想主义。“一个政治新纪元的开始就如同一个障碍的打破……因此 60 年代或许是英勇的、清晰的、有创造力的、不连贯的、喧闹的、全方位都活力四射的。最重要的是，将会对行动、领导层和信心产生意义。”过了 8 年多的时间，施莱辛格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到纽约演讲，在多年的动荡和混乱远胜于创造力的经历之后，他的活力被深深的个人悲痛所代替。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是由一次“犯罪”证明的“令人恐惧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着暴力历史的暴力民族，暴力的天性从我们国家生活的血液里渗出。”然而在 1960 年，世上一切都还是好的。

约翰·F. 肯尼迪

自由主义者在 50 年代末正确地解读了这个国家的特性。许多迹象表明这个国家正满怀渴望，即使不是为了复兴的理想主义，那至少也因为一些比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及温和的统治更有趣的东西。消费文化留给年轻人一种空虚感，他们通过听摇滚乐，读《麦田守望者》(1952)——J.D. 赛林格关于被疏远的青年的小说，或者认同于好莱坞年轻的自我放逐者——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以此作为反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禁锢的反应。文化的不安定则更进一步，颓废派诗人，特别是艾伦·金斯伯格，由于从事同性恋、精神上的神秘主义及种族混合的题材，遭到一致的反对。无疑地被限制在少数年轻人中间，逐渐显现的不守成规和异化的特性与处于发展状态的自由主义的复苏相结合，预示着一个巨大 9 的觉醒。

自由主义者在 1956 年后需要的是一名新旗手，史蒂文森第二

次失败为他造成了一种(舆论)倾向。对于一般的选举人,他是个十足的精英分子,一个十足的旧式英格兰一新教徒统治层的成员。因为对手未能出场,就为约翰·F. 肯尼迪留下了空子。作为来自于一个古老的波士顿政治家庭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肯尼迪也有缺点。他被老式的联盟,保守的天性,以及一个以一心一意想使儿子致力于权力而闻名的父亲所沾染。老约瑟夫·肯尼迪——一个依然对美国佬的精英分子表示轻蔑的被同化的爱尔兰人——培养他的儿子们从事政治而让女儿们完成学业。在他的大儿子乔·肯尼迪于二战中牺牲后,这位父亲把注意力全转向了约翰,一个曾经多病的不明事理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约翰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两样东西:自我推销和对软弱的蔑视。

尽管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中有所作为前已经在国会度过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他却从不认同于民主党的自由主义。当他开始向总统宝座努力的时候,通过把阿德莱·史蒂文森的论题据为己有,从而赶上了正在上涨的自由主义潮流。他为了提名的行动始于1957年,在一次关于第三世界外交政策的演讲中,他指出,正是共和党人对现状毫无创见、不加是非的承诺把关系搞糟了。与其自动地与民族主义运动对抗,他强调的:“合众国,本身作为一个政治革命的产物,必须双倍努力以获得民族主义领袖们的尊重与友谊。”

只有加尔布雷思和其他几个人迅速加入了肯尼迪阵营。其他自由主义者或是希望赫伯特·汉弗莱——自吹在民权和工人问题上有很强履历,或是史蒂文森能得到提名。许多人则由于肯尼迪的个性或者他的并不鼓舞人的国会投票记录而犹豫不定。其他人则继续怀有反天主教成见或者为他与古老的爱尔兰核心政治的联系而沮丧。还有一些人发现他的好斗的冷战言辞是煽动性的并

且是危险的,与他提倡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再思考十分不一致。

即使他缺乏党内的忠心之士,肯尼迪还有其他很快被其竞争者嫉妒的实力:金钱,技巧,以及一帮紧密的顾问班底。在重要的西弗吉尼亚5月初选中,他显示出了他懂得如何运用其全部实力。尽管该州被认为是过于为新教正统派运动所渗透,而汉弗莱也将在此击败他,肯尼迪还是为自己的形象而努力,使亲属和名人志愿者遍及该州。在必需的时候,他的竞选活动也会变得残忍无情,并且四处传播关于汉弗莱在二战中没有服役的谣言,那是一个汉弗莱永远不会原谅的举动。肯尼迪的成功第一次证明了他已经足够熟练到克服反天主教的成见以及避开不充分的国会生涯这两个方面。

在约翰·肯尼迪的成功中,与他的政治技巧一起列为基础的是他的形象——远比纯粹的性的吸引力要严肃,但又不像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那么深刻。这就容许他把天生的保守主义与一种对未来的颠覆感结合到一起。他的贵族化的风度和工人阶级特色的吸引力与一种有着青年人的活力和能量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突然间你有些激动起来,”一位参与竞选活动的工人回忆道,“你找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有孩子,喜欢在前面的草坪上玩橄榄球……他做的10一切都显示了美国的朝气及活跃。”肯尼迪对传统政治权力的明显期望并不能隐藏那些暗示,即就其本性而言,他更愿意威胁到主流的规范。正如小说家诺曼·梅勒在关于肯尼迪的最著名的描写之一中写的,他将震撼“超级市场的灵魂,外表纯洁和进行心理治疗的人的相同外延,包装起来的日用品和大农场家庭。”他的思想和方法都不是新的。新颖的只是他本人。“他穿着滑雪教练的深橙棕色卡其布军服,”梅勒夸张地写道,“当他冲人群微笑时,他的牙齿出奇的白,而且在五十码外都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洛杉矶大会

看到肯尼迪的到来,梅勒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部电影的场景中,如同“橄榄球英雄,校园之王,来到校长的家……恳求校长以得到他女儿的吻和当晚上演音乐剧的许可。”

肯尼迪的部分魅力是作为候选人与电视的兼容性,正是从那之后电视才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特有要素。肯尼迪不像他之前的政治家,他出于本能地接受了这种新媒体,或者准确地说,是电视接受了他。并不仅仅是他灿烂的微笑或者是“滑雪教练”的外表在电视上表现出色。他的暧昧,他的柔韧,举动中不带棱角,这一切都使得他成为一名完美的电视的“求婚者”。电视正如在一本那个时代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有影响力的书《理解媒介》(1964)中,马歇尔·麦克卢汉强调的“冷”媒介。照麦克卢汉的观点,电视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媒介并与观众保持着一种“深奥的”关系:通过倾听、观看、感受,使观众全神贯注在电视上。“观众是屏幕,”麦克卢汉写道,因此也是信息传播的热心参与者。肯尼迪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他的自我恳求式的幽默,当他忍受不理想状态时的轻松,例如在演讲时他在“ums”和“ahs”上结结巴巴,还有他的“深橙棕色卡其布军服”也很符合麦克卢汉对电视的描绘。

肯尼迪对电视贡献的经典例子是在9月举行的与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一次辩论。肯尼迪,就像任何优秀的演员那样,为辩论进行了排练,由富有经验的助手们训练他普通回答与婉转回答的艺术,并确保他的着装正确得体。另一方面,尼克松的准备却像是回到了在大学辩论队的日子。他在辩论前的晚上到达芝加哥,不排练也不放松,他把自己关在旅馆的房间里。他只有十分钟长度的摘要,只能希望依靠他竞选演讲中的“存货”作为回答。他没有演戏的着装,浅灰色的外套融合在背景中,因此,正如新闻记者西奥多·怀特所写的,他“消褪成了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紧

张,几乎是惊恐不安,处处怒目而视,偶然地显出形容枯槁。”那些在电视上看到全过程的人多数喜欢肯尼迪,而那些听收音机的人则对两人的评价相等。

尽管这场辩论增强了肯尼迪的自信,增加了他的支持者的规模,造出了声势,但他由于仍居于劣势而被迫竭力寻求支持。最后,他获得了民权权力集团的支持。无论是他还是其他权力集团,在他们的路线中都不接受民权运动。自由主义者真的不喜欢种族隔离,但他们认为特别是在南方这是一种过时的习惯,如果属实,那么时间和一些技术性的方案就可以使它消失。肯尼迪自己就做了过多的暗示,当他偶然地面对哈里斯·沃福德——一个专门研究民权的竞选活动的助手时,“在5分钟内,”他对沃福德说,“列举出10件总统应该知道的,清除那该受诅咒的民权运动的混乱的法子。”沃福德告诉他,“大笔一挥”就可以让总统消除联邦住房供给的歧视,因此“大笔一挥”也成了候选人位置的注解。

一个礼貌的举动最终赢得了小马丁·路德·金和其他的民权鼓吹者。在10月中旬,金在亚特兰大与其他抗议者一道被逮捕。但他不愿被保释,而接受了宣判,被判在州立监狱服苦役6个月。沃福德确信肯尼迪给金的妻子科雷塔打了电话并表示他的关注。这是一个潜伏着危险的举动,可能招致南方民主党人的敌对,但它还是起作用了。民权运动中的许多人,包括老马丁·路德·金,在这个电话后都把票投给了肯尼迪。年长的金对记者们说他从未想过会把票投给一位天主教徒,但现在他不得不这么做。肯尼迪对助手说:“想像一下,马丁·路德·金有一个顽固的父亲,我们都有父亲,不是吗?”

这个电话为肯尼迪带来一批重要的支持者,又没有在“固化的南方”失去民主党人。即便这样,这次竞选也是现代美国历史上最